

无产阶级专政与官僚主义者阶级

——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体会之四

马 彦 文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无产阶级怎样防止政权得而复失，怎样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特别是防止官僚主义者阶级篡夺党政大权、改变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毕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揭露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及形形色色官僚制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官僚、官僚主义、官僚制度，都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剥削者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豢养大批的官僚。这些官僚，是统治阶级中直接掌管国家机关的一个特殊集团，它集中代表和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即使是所谓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骨子里头仍然是资产阶级官僚政客的统治，是社会机体的“寄生赘瘤”。在痛斥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对反动官僚的崇拜和向往时，他们反复告诫：“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即必须使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破坏官僚制，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把国家由社会的主人变为社会的公仆。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压迫剥削阶级的工具，“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这种新型的国家，在本质上是同官僚、官僚主义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这个基本点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

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因此,还存在着产生官僚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着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重新变为社会主人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为了克服这种危险而采取的两项重大的革命措施:一切公职人员普选产生,接受群众监督,并可以随时撤换;取消一切官吏、尤其是高级官吏的特权,只付给公职人员跟工人相同的工资。这样,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上“**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防止在旧官僚被打倒后再产生新官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和防止新国家机器变质的光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第235页)。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并根据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加以丰富和发展。列宁指出:在新时代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急剧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全面反动,官僚军事机器异常庞大;彻底摧毁这个机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迫、最直接的实践问题。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十月革命首先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

列宁深刻地分析修正主义和官僚制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下,帝国主义者为了瓦解工人运动,从掠夺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丁点残羹剩饭,豢养一批工人贵族、工会官僚。这些修正主义者拜倒在帝国主义的官僚军事机构面前,竭力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拼命鼓吹“内阁主义”,胡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开始。他们对资产阶级内阁的肥缺垂涎三尺,削尖脑袋往里钻,一心想沿着议员席到部长席的阶梯,爬进官僚的行列。他们是资产阶级官僚的重要补充和可耻帮凶。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修正主义者继续贩卖“内阁主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之流,力图把社会主义革命变为“内阁”的更换和高官厚禄的再分配,主张“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结亲”,使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变成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考茨基曾经叫嚷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非有官僚组织不可”。列宁说:“**考茨基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连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些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完全实现。**”(《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那些只想当官不想革命的修正主义头子,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民主制,一朝大权在握,就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比旧官僚还厉害。在他们的包庇下,被赶出了大门的沙皇时代的一些旧官吏,又从窗户钻了进来,拿着党证或戴着红领

章，混进红色政权。在他们的毒害下，国家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官做老爷，逐渐蜕变为新官僚。修正主义头子是旧官僚的保护伞，新官僚的教唆犯，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挂帅人物。

列宁说：官僚是“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列宁选集》第1卷，第103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升官思想**”（《列宁全集》第7卷，第357页）。根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列宁还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内部敌人，与其说是资本家和地主……，不如说是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3页），“**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列宁号召无产阶级始终不渝地和官僚、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他教导无产阶级国家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成为“**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列宁选集》第3卷，第20页），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并接受他们的监督。列宁曾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府各部部务委员会以及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深入基层。俄共（布）十大还专门作出决议：“必须开始逐步实行把长期担任苏维埃或党的工作的人员派到机床或耕犁旁边去工作，而且应当按照工农的普通生活条件去安排。”列宁高度重视劳动人民参加管理，强调“**使所有的人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深刻阐明这一战略措施的革命辩证法：“**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同上）。列宁在病危期间仍然十分关心国家机关的改革，在他口授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遗著中，反复提醒全党和全体人民：“**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要清除“**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列宁选集》第4卷，第705页），要“**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列宁选集》第4卷，第693页），即从工农群众中，从经过内战和贫困考验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中，培养和挑选优秀人材，把他们提拔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去，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

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列宁号召要清除的那一类官僚渣滓，他们集中体现了新旧官僚的反动本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使官僚主义者阶级在苏联恶性膨胀，葬送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严重的历史教训。严峻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官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者就是修正主义者。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马列所开创的反对官僚、官僚主义的革命事业。毛主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官僚主义者阶级篡党窃国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

一九六四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总代表，变本加厉地推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刘少奇那一帮子官僚主义者阶级，追随苏修叛徒集团，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迫不及待地想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及时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客观存在，指出它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的阶级对立，发出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战斗号召。和这一重要批示同时，毛主席还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同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即走资派之间的阶级大搏斗；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在这场斗争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使我们明确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这些是对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我国解放后历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第一，毛主席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一个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高度。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标志着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旧官僚反动统治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为消灭官僚主义者阶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要把它最终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艰苦奋战。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阶段，充满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掌握并运用国家机器向资产阶级进攻，而资产阶级则拼死要夺回失去的政权。他们最初的复辟尝试，往往是想凭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暴乱为旧官僚重新上台开路。当这种尝试一再破产之后，就进一步在争夺工人阶级的党政干部、改变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方面打主意，力图从堡垒内部来夺取堡垒。

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旧中国有过长期的统治历史，旧官僚的势力盘根错节，官僚制、官僚主义的遗毒无孔不入。资产阶级正是依靠这种势力，扩散这种遗毒，包围和腐蚀红色政权。同时，党内资产阶级还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保护旧官僚的残余并培植新官僚。我们党从来就是在阶级关系极其复杂、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环境中进行战斗的。党的队伍中，早已混杂着敌人派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被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把参加革命看作入股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想从执政党的地位捞取好处的官迷。这些人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只要有了一官半职，特别是当上了大官，很快就成为官僚主义者。他们适应国内外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联结起来，组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出现，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激烈的表现，是阶级斗争必然引起的阶级分化。阶级敌人胡诌什么官僚、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本身的产物，这是一种向红色政权栽赃、嫁祸的反动逻辑。列宁在分析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存在着的某些“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的缺点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新旧官僚虽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根子都是一条，剥削制度的毒根。一个是旧土壤上的旧毒草，一个则是旧土壤上的新毒草。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是革命队伍里的钻心虫，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指出：“**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毛主席对老的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尖锐对立的阶级内容的这个概括，同样是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概括。这种对立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根本对立。

推行修正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是党内走资派，即官僚主义者阶级

最本质的特征。他们在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已经破产，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已经被打碎之后，仍然顽固地坚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去“修正”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力图按照什么“国家是社会的最高主宰”、“官吏是人民的天然尊长”、“官高理应禄厚”之类的官僚哲学去改造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他们梦寐以求的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流血牺牲，历尽千辛万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逐步实现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他们把权力交给国家干部，正是要干部为本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是民主革命时期反对旧官僚斗争的继续，是进一步解决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打败党内资产阶级，才能确保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

第二，毛主席深刻揭露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反动本质，并指明它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新旧官僚都是吸血的寄生阶级，这是它们的共同本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吸工人血方面，具有一些比资本家还厉害的新特点。

首先，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权力转化为资本，又把资本转化为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基本途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是沿着资本转化为权力，权力又转化为资本的道路进行的。资本力量的膨胀，迫切要求有自己的政权来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吸血的罪恶行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又用政权来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一贯遵循这样两个信条：一个是“你有多少钱，你就值多少钱”，“你有多大资本，你就有多大权力”；另一个是“你值多少钱，你就有多少钱”，“你有多大权力，你就有多大资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揭露施蒂纳所宣扬的道德训诫一样，“你有多少权力，你就有多少货币，因为你为你争到多大的权势，你就有多大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2页）这两个本质相同而又互相补充的信条，活生生地反映了资本和权力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更加迷恋这些信条，并且在新的形式中受资本和权力相互转化规律的支配。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已经不可能完全沿着旧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和权力的道路进行了，而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篡夺党政大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上，把篡权作为吸工人血的先决条件。篡权、改线、吸血，这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三部曲。在社会主

义时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他们的命根子。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就是他们把权力转化为资本，又把资本转化为权力，吸工人血的过程。他们只要有了权，总是要把职权变为特权，把人民给他们的管理权和服务权，变成压迫和掠夺人民的权力，干着无本万利的勾当。在他们权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要把劳动人民排除在管理和计划工作之外，把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管理权和支配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名存实亡。和所有制的这种蜕变相适应，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也被篡改成为按权力和资本进行分配。他们在“照顾领导”、“工作需要”等堂哉皇哉的名目下，保护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不择一切手段，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大量侵吞和挥霍人民的劳动成果，过着寄生、腐朽、糜烂的生活。他们把权力转化为资本后，又把资本转化为权力，通过扩大商品货币关系，变商品、货币为资本，收买、拉拢干部，结党营私，扩大自己的权势和地盘。普通劳动者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下，不仅遭受经济上的残酷剥削，甚至还要遭受超经济的剥削和奴役。这种权力和资本的相互转化，如果任其恶性发展，就会形成比资本的运动即专门为“**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5页），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导致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

其次，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取了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革命经验，继承了历代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伎俩，把疯狂的掠夺性和虚伪的欺诈性更诡谲地结合起来。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和变化，剥削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历史的辩证法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随着阶级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剥削的形式愈来愈隐蔽，剥削的程度愈来愈厉害；剥削关系发展的总体过程是这样，每一种剥削关系发展的具体过程大致上也是这样。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可以说是极其厉害的。他们恨不得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劳动者“**‘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4—335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无论是绝对的数量，还是相对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剥削形态。可是，这种剥削被“等价交换”的纱幕掩盖着，“**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4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则被更加虚假的外观掩盖起来了，因为他们都打着反剥削的社会主义旗号，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甚至“老革命”、“老功臣”的外衣，一般也不公开地以个

人的名义开工厂、办农场，占有生产资料，‘直接进行雇工剥削。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同志关系，掩盖着剥削和压迫的关系。他们的部分生活资料，也往往是在合法的形式下取得的。这些确实是历史上的剥削者和党外资产阶级所不能比拟的。就剥削程度而言，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不能不受到种种的限制。但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极其寄生腐朽和贪婪的本性。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和经济的高度集中，官僚主义者阶级篡权复辟的阴谋一旦在全国得逞，他们就可以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利用这种高度集中的形式，变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法西斯集中制，他们就能比任何剥削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比那些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奴隶制、封建制的统治者，比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财阀所能直接控制和支配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更大得多。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的程度，肯定要远远超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如今日的新沙皇远远超过老沙皇一样。

再次，社会主义时期的新老资产阶级，是一个处于被消灭过程中而又不甘心灭亡的阶级。作为这个阶级的主体的党内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即党内资产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还掌握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并利用这种权力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巴不得一口吸尽劳动人民的血，一下子把社会财富统统据为己有，去享受历代官僚享受过的以及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的富贵荣华。如果说资产阶级在上升的时期，客观上还作过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的话，那末今天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已完全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成为社会机体的寄生虫。一切没落阶级那种临死前的疯狂性和暴发户的贪婪性，历代官僚最黑暗、最腐朽、最反动的东西，都在这个阶级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它是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吸血鬼，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必须作为斗争的重点对象、革命的主要对象，彻底打倒，直到最后消灭。

第三，毛主席提出管理也是社教的英明论断，为无产阶级国家规定了管理的路线。坚持三同是缩小旧的分工差别、铲除滋生官僚主义者阶级土壤的重大措施。

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管理总是阶级的管理。剥削阶级国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无产阶级国家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管理来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为无产阶级国家规定了管理的路线。为了搞好管理，必须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断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把管理和铲除官僚主义者阶级、彻底消灭阶级、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联系

起来；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群众，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旧的分工差别，把管理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直接生产者手里，把管理提到反修防修斗争的高度。如果只是从生产上、业务技术上谈管理，势必要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在历史上，分工首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阶级的分化则是分工的后果。**“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剥削阶级为了一己的私利，总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加深分工的差别，使得分工愈来愈带有畸形和狭隘的性质，变成尖锐的阶级对立，并日益暴露出要缩小和消灭旧的分工，建立新的革命分工的迫切性。

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为缩小和消灭旧的分工提供有利条件。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处在不断变革的过渡状态中，旧事物在灭亡，新事物在产生。分工的问题也是这样。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一般说来，也已经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认真贯彻**“鞍钢宪法”**的企业、单位出现了管理人员参加劳动，直接生产者参加管理，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样的新事物；出现了大量的像焦裕禄、王国福、门合等等当“官”不像官，大公无私，忠心耿耿的人民公仆。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固定的分工，反映这种分工的旧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固。在分工问题上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新旧官僚主义者阶级为了复辟旧制度，又总是不断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林彪就无耻地鼓吹“诱：以官，禄，德”，把旧的分工绝对化、神圣化，刘少奇、邓小平一类也总是竭力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分工论”是“天下之通义”。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的管理路线，利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金鞭子，“管、卡、压”的钢鞭子，“专家治厂”的老路子，以利相倾，以势压人，把剥削阶级的管理变本加厉地复活起来。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破除，旧的分工还没有消灭，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差别，就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成为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就会导致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产生。**“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3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能及时地采取革命的措施，建立和不断地完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滋长，那么，按照量变质变的规律，到一定的时候，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地位，

就会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

为了贯彻管理也是社教的根本路线，缩小和消灭旧的分工，防止产生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还明确地提出了两项重大的措施。首先是强调管理人员要**“到车间小组搞三同”**，不能搞特殊化。这项措施十分准确地打中了旧分工的要害：管理人员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三同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三同的中心和基础是同劳动。只有劳动，才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只有劳动，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脱离劳动，不劳而获。世界上的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管理人员如果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和直接生产者的鸿沟就会不断地扩大，最后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打倒。群众说得好：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劳动要变修。为了反修防修，毛主席一再指示全党，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另一项重大的措施就是强调管理人员要**“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实现这项重大措施，也得建立在三同、首先是同劳动的基础上。劳动群众是三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为了学到手艺，管理人员必须坚持政治挂帅，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的技术观点，批判“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放下臭架子，向直接生产者学习，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力求做到红与专的统一。否则，即使学到一星半点的手艺，也只能是**“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列宁选集》第3卷，第394页）。

毛主席提出的这两项重大措施，必须作为制度，长期地、无条件地坚持下去。这样做，不只有助于加强党对生产、对业务技术的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的管理；更为重要的是能更好地贯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有利于管理人员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做到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真正做到和工农划等号，既当“官”又不象官，既是管理者，又是普通劳动者，铲除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土壤，最后实现人类历史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最大飞跃。

毛主席一贯重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号召全党**“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了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高度，这样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给官僚主义者阶级以新的沉重打击。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必将在反对走资派、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即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